

廿一世紀港穗課程革新方向

袁月梅

引言

港、穗兩地由於地理位置相近，交通頻繁，特別是在貿易上，香港是廣州對外經貿的橋頭堡，而廣州則是香港對內經貿的橋頭堡(周維平、丘杉，1996)，港、穗兩地的經濟合作更能帶動整個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增長(李永杰，1996)。香港成爲中國特別行政區後，首份施政報告(1997)特別強調要加強中、港之間的合作，而第三份施政報告(1999)更特別提及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主要城市如廣州、深圳等的關係。一九九九年的施政報告書建議增設協調中港商貿的聯委會，進一步確認兩地互惠的經貿關係。踏入新世紀，人力資源的開發是中港兩地視爲發展經濟和科技的主要政策之一。爲了實踐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協同發展的政策(施政報告，1999，第 48 段)，港穗兩地的教育發展將有更密切的關係，兩地的青年人交往亦因而會更頻密，他們更需要學習如何彼此相交，互相接納及幫助，爲彼此之間的資源分配作好準備。故此，教育在各方面也需要重新思考、改革。

港穗課程發展

廿一世紀的香港特區教育與中國大陸相連。近年來兩地教育工作者已不斷加強彼此間之學術交流。不少研究對兩地課程之合作與發展以及面對新時代之需要作出的探討(Bremner, 1997; Yuen, 1995 及 Postiglione, 1991)。單從科目上的改變看，九七年回歸之前，香港學校的課程如社會科、政府及公共事務科以及中國歷史科等都加強了學生對中國大陸的政制、史地的認識(Morris, 1992)。九七年後，本港學校的課程內容也增強了學生態度及技能方面的培訓，使學生更能在新的時代中發揮貢獻。在九七年施政報告中的教育部份第 102 段提出香港學校課程理應切合新社會的需要，加強學生在科學及數學方面的知識。又於 103 段提出「協助香港青年人面對未來社會的挑戰」爲主要的培訓目標(施政報告，1997)，而九九年施政報告中的教育部份第 53 段更指出要改革香港的教育制度，使其與時並進，創造以知識爲本的經濟。

另一方面，近年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廣東的密集式勞動產業面臨轉形改造，爲製作大量新科技發展技術知識形的高值產品，這樣才能提高其市場競爭力，故此有人提出了「智力興技」的教育取向(梁英，1991，頁 38-39)。廣州是廣東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爲配合廣州社經的發展，有學者指出，廣州青年的思想教育應朝向自主和社會分析的方向，培養他們的開放態度和判斷

力，以迎接新社會（譚建光，1998）。廣州政府也特別著重高中教育的結構改革與調整，並為企業開發人力資源，著重培訓學生的實用技能(葉世雄，1994)。根據一項針對港穗青年就業比較的研究指出，雖然雙方均以專業技術人員為首選，但廣州青年明顯比香港青年更熱切於專業技術的追求(杜淑冰、謝惠娟，1998)。

本文作者曾就香港特區教育如何培養廿一世紀能幹青年人，而對課程作出建議(Yuen, 1995)，指出能幹的青年人應具備以下素質：獨立思考能力和明辨是非；公民意識及應變能力；兼有一技之長。而一項由港穗澳青少年研究所(1997)在廣州所作的調查發現，廣州青年最迫切的社會需要分別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條件」、「治安良好」、「環境污染改善」、「愛和被尊重」等。價值觀方面，他們則選取了「人品」、「健康」和「知識」為人生追求的目標(頁 11- 12)。要在新世紀為學生提供適合的課程，使課堂內容和日常生活掛鉤，中港兩地課程工作者和參與者必須進一步了解兩地學生的學習素求，設立渠道聆聽他們的意見。另外，教育工作者(特別是南中國城市的教育工作者)也得緊密合作，分享彼此的教學經驗。如能對兩地的教育問題作進一步交流，則更有利於改進兩地之教育(盧、蕭，1988)。為此，本比較研究旨在從港穗青少年的角度，探討他們對廿一世紀挑戰的看法，和他們對現時學校課程所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課程發展理念

在本港，課程發展一直都以應試為主導，較偏向注重泰勒(Tyler, 1949)的目標導向課程範式，著重「技術興趣」(technical interest)，即透過規則行為，對環境、學習者的興趣及老師的教學作出控制的一種教學過程，過程中著重目標、教學效率、與及知識和技能的傳遞和掌握，少談學生的感受和參與，學生基本上受著教材和老師的控制(單丁，1998，頁 235)。課程原則上以選定的出版社課本內容為主，很少調適，更少革新。要在課程實施上產生效果，施瓦布(Schubert, 1986)卻提出「實踐興趣」(practical interest)的概念，並認為學生與老師同樣是課程的創造者和主體。任何水平、年齡的學生都可提出下列問題：什麼是值得我學習和體驗的？我怎樣才能邁向這個方向？讓學生與老師共同參與課程發展，其實可以改善學生的行為，也會使其更為成熟，這與傳統的目標為本的課程範式很不同(單丁，1998，頁 237)。這課程發展取向其實與教育基本原則 -- 學生為本 -- 極為相符，與今天我們鼓勵的獨立和自主的學習互相吻合。

早在半世紀前，杜威(Dewey, 1968)已經提出以學生為教育的主體，課程內容應以他們的親身經驗為基礎。後來 Fullan (1996)亦指出，學生是課程最終的消費者，而課程革新最終是為了使學生能更有效地學習，學生對課程革新的參與故此亦顯然是必要的。Behar-Horenstein 等課程論學者(1999)則強調要使學校課程發展更專業化，教育工作者便要首先釐清課程目標，並要給與學生參與課程發展的

討論，讓他們藉著了解、認識和參與等把學習理論轉化為個人化的知識，並具體地應用於生活中(頁 5-6)。多位學者都以課程的實用性和適切性為最基本的發展取向。

這樣，由加強學生對學習現象的了解開始，引導他們去發掘有關問題，再啓發他們尋求探究問題的原因，不但可以使他們投入學習，更有助他們積極思考。有學者更指出，如果教育最終是爲了適切學生的需要而制訂，以減低他們對課程的抗拒感和其不恰當的行爲，讓他們參與課程設計便十分重要了(Gilbert and Robbins, 1998)。可惜的是，學校教育的現實卻不常與這教育理想吻合。學生雖然是課程受用者，但鼓勵或容許他們參予課程發展的情況並不普遍，無論是在西方或東方社會，教育決策者往往都只是以自己的角度去發展和制定課程，而學生則只能扮演一個被動的角色。一個有關於學生在學校中的角色的調查報告顯示，越高年級的中學生越感到教師不明白他們的想法，亦不會徵詢他們對課程內容的意見，七成被訪者對學校更產生疏離感，認爲學校祇是一所幫助他們學習謀生之道的機構而已(Fullan, 1996)。

課程學者認爲在爲學生設計合適的課程之前，應先瞭解學生對未來社會的觀感和認識，並從他們的角度去了解他們對學習內容的意見，讓他們體驗課程設計的過程，這些對課程目標的訂定都很重要的(Skilbeck, 1984; Lawton, 1978; 1975)。近年來，本港常有人提倡課程發展和革新方向應以學校爲本位，並加強學校老師對課程設計、實施、管理和評估的專業培訓。校本課程模式(Skilbeck, 1984)更應賦予教師和學生參與發展課程內容、學習範疇以及課業剪裁的空間。這種注重師生參與和互動的課程發展模式和趨勢，不但挑戰傳統由上而下的硬性課程決策做法，更能體驗以學生爲主體的教育精神，有效地回應了對現今港穗兩地應試教育的批評。

在校本課程模式中，學生的親身經驗被視爲具有豐富的教育潛力，適當的運用它能使課程更爲適切學生的需要，特別是照顧了教師和學生之間在經驗、社會地位、智能、動力、學習形式和興趣等方面的差異。故此，在面向廿一世紀的今天，校本課程的推廣實在應該成爲港穗兩地的課程革新的方向，讓學校體驗由下而上的校本精神。雖然兩地的決策者常會忽視教育界在這方面的需要，但筆者認爲學生的參與在廿一世紀港穗課程革新中將會是重要的議題之一。基於這大前提，本研究旨在從學生本身的角度出發，探討他們對各學科知識的需求和對未來社會的期望等，並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至九八年三月分別於港、穗兩地進行資料搜集，再經筆者分析、比較和整理。

研究設計

本研究從瞭解本港的中四至中七與及內地高一至高三學生對課程、個人出路和社會期望為出發點，目的在於搜集有關資料，協助兩地課程政策者訂定和革新下一世紀的課程，期望教育界藉此為青少年提供教育，讓他們獲得適切的知識和技能，並能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以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本調查研究首先採用問卷調查，搜集了港穗兩地的高中學生對現時課程的意見和建議，並作出比較分析。此外，為了使本研究的資料內容更為豐富，進一步錄取個別學生對問卷內容，特別是其中的發揮性題目和一些個人關心的問題和意見，筆者更於兩地進行了數個訪談，加入問卷調查的結果作較全面的分析。

研究樣本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方式，分別於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在香港和廣州進行。調查對象為香港中四至中七和廣州高一至高三的主流學生，共發放了 3300 份問卷，其中廣州中學佔 1500 份，香港中學佔 1800 份。收回的問卷共 2292 份，其中香港佔 1338 份，廣州佔 954 份。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結果分別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而搜集。本文為量化分析部分。問卷共設十八題，內容分為多個部份：學生對課程內容的觀感和評估(1-3 題)；預計在將來社會遇到的挑戰和應付能力(4-5 題)；最想擁有的知識和對能幹青年人的素質看法(6-8 題)；廿一世紀挑戰和個人裝備(9-10 題)；能幹青年人的條件(11 題)；改善課程的意見(12 題)；個人工作和理想等資料(13-18 題)。有五題是發揮性題目，其餘是非發揮性的。題目的次序、用詞和整體內容排列均曾在預試後被修正。

研究方法

研究員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三月透過港穗兩地的朋友，接觸了一些在職教師，並在徵得他們的同意和協助下，先後向穗港兩地的中學發出了問卷合共 3300 份(廣州 1500 份，香港 1800 份)。

先導研究

為了檢視問卷設題內容及研究方法之可信度，筆者先於廣州與三位老師作了訪談，繼而進行問卷切題，數天後再於廣州中學派發 150 份先導問卷作為預試。預試結果顯示發揮性問題過多，某些用詞和題問內容需要重新修訂，問卷經修改

後成爲了現今的版本。

研究結果

收回的問卷共 2292 份，其中廣州佔 954 份，香港則佔 1338 份。被訪對象來自六間廣州中學，約廿五間香港中學。由於此研究是以便利抽樣方法進行，問卷多是從中介收回後交予筆者，祇有三間香港中學直接把完成的問卷寄回，故此，較難提供一個準確的學校數目。被訪者中，有 1083 位男生和 1176 位女生，33 人沒有提供性別資料。問卷調查期間，被訪學生雖然忙於準備校內考試，但此次收回率仍達百分之六十三(穗)及百分七十三(港)，效果尙屬滿意。

樣本分佈情況

由於廣州中學等級制度與香港中學的五等級不盡相同（內地多以省一級重點學校爲一等如此類推，香港中學則以五等 Band 1 至 Band 5 排名），筆者是根據該學校教師、學生或中介所提供的等級資料而把它們分類。下表爲 2292 名被訪生所就讀的學校等級分佈情況：

表一 研究樣本

學校等級人數	一等 (980) Band 1		二等 (792) Band 2		三等 (143) Band 3		四等 (0) Band 4		五等 (371) Band 5	
	穗	港	穗	港	穗	港	穗	港	穗	港
學生人數	478	502	198	594	0	143	0	0	278	93

表一顯示，被訪穗生中，有 478 人就讀於一等、198 人及 278 人分別就讀於二等及五等學校。另一方面，港生中，絕大部分學生(1096 人)就讀於一、二等學校，143 人及 93 人就讀於三等及五等學校。這次調查研究的對象中過半數就讀於本港一、二等級和內地重點學校的學生(68.9%)，故此研究結果反映出他們對日後在社會上所遇上之困難及對現今課程之看法。

樣本對所面對之挑戰的看法

有趣的是，從自我能力評估的項目結果中，發現接近半數被訪者(45%)認爲自己有信心可以應付社會上困難(穗:20.4%; 港:24.6%)；24.9%認爲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一般(穗:9.3%; 港:15.6)；而 17.1%選擇難以估計(穗:6.1%；港:11.1%)。下表展示了被訪者預計在畢業後將會遇上的困難。

表二 (您預計畢業後，在社會上會遇上什麼困難?)

	語文應用	高科技操作	人際關係	適應能力	獨立思考能力	其他
廣州	11.6%	43.7%	20.5%	15.4%	3.8%	5%
香港	26.1%	27.8%	21.4%	14.7%	5.8%	4.2%

表二總結了穗中學生預計日後自己在社會上將會遇上在「語文運用」、「高科技操作」、「人際關係」、「適應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等方面的困難，選項可多於一個。有7位被訪者沒答此題。整體上，兩地的被訪者認為「高科技操作」會是他們在畢業後最大困難的，約佔三成(34.4%)；其中穗生佔18.2%，港生佔16.2%。這結果反映出前者較後者關注自己日後能否操作先進科技。此外，調查又發現，兩組的學生對畢業後所面對語文應用的困難有顯著不同之意見。對於穗生來說，語文應用的挑戰不及高科技操作的大；相反地，港生則認為語文應用會較高科技操作困難。這結果顯示出穗生對語文運用的信心大於港生，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語文程度較高。另一方面，港生對語文運用的看法，與近年來香港政府積極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措施，以及不少教育工作者對港生語文程度的關注等因素(如曾榮光，1998)之間，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亦反映出學生及教育工作者同樣地對語文教育不滿。

學生對課程的評價

中學生個人對課程的評價、感想或看法基本上會受到他們的社會氣候、生活環境，身邊的事和人(如勞動市場、家庭角色及人際關係等因素)所影響，。所以，學生對課程的評價和要求，亦反映了他們對勞動市場需要那一類技術專才和那一方面的語文能力人才的關心。越高年級的學生對社會現況的關心就越大，相應地對學校能否裝備他們應付這些挑戰的反應便越為迫切。

學科內容能否幫助青年人面對社會上的種種挑戰

被問及現在中學所提供之學科內容能否幫助青年人面對社會上的挑戰時，78.7%學生表示不能夠或絕不能夠。其中被訪之學生中，一成(11.1%)穗生對學科內容較港生的為滿意，認為內容充足，而港生則少於一成，祇有5.7%。雖然61%的整體學生對現在所修之課程滿意程度為普通，但被訪港生的意見則較穗生為分歧。17%港生不滿意所修之課程，而穗生祇有12.9%；又19.8%港生認為課程滿意，14.9%的穗生持相同意見。6人沒填此項。整體學生中有68.9%的學生來自二等或以上的學校。

學生對現今所修課程的滿意程度

本研究又發現，被訪之男女生對現在所提供之課程滿意程度並不存有性別上之差別。以T檢定法測試，發現男女的平均值相若(男生=2.9547；女生=2.9489)，這結果顯示性別和對課程的滿意程度沒有關係，男生和女生對課程的看法接近。

另一方面，中五及中六學生對課程滿意程度差異亦不大，(以 Multiple Range 和 Scheffe 檢定法計算，平均值分別為 2.2556 和 2.1682)。但與中七學生(平均值 2.0568)的結果比較，他們對課程的滿意程度卻有明顯的分別，表明了中七學生對課程的滿意程度與中五、中六生不同。這可能因為中七學生比中五會考班及中六班面對更嚴厲的升學競爭，故其對課程的不滿亦較大。雖然近年來港穗兩地增加了不少專上學位，但某些熱門的科目如工商管理的競爭仍是很劇烈。對於這群中七預科生來說，畢業後他們就要面對就業市場的挑戰，不能不對課程的適切性與及課程能否對日後謀生有幫助作較切身的評估。他們的不滿反映著他們對自己應付社會(就業)能力以及現時教育制度適切性的意見。

整體上，被訪者認為學校在以下各方面給予他們的知識和技能訓練，最能幫助他們成為能幹的青年人：(一)思維訓練 (44.3%)、(二)語文運用 (29.4%)、(三)社交 (11.2%)、(四)運算技巧 (8.5%)、(五)德育(4%)、(六)其他或無作答 (2.6%)。來自不同學校等級的學生均把德育排列最後，而把思維訓練排於首位。另外，港、穗學生對科目內容之評價有明顯之差別(χ^2 皮爾遜數據， $F=0.02466$; $P<0.05$)。穗生對語文運用及運算技巧的評價比香港學生為高。港生對校方所提供之德育及社交訓練評價則比穗生為高。

渴望擁有的知識、技能及素質

整體來說，港、穗生最希望得到的知識、技能及素質，均與他們未來職業取向有很大的關係。例如港、穗生同樣希望獲得下列各項技能：英語運用、社交技能、電子科技、普通話、說服力、獨立思考能力、電腦操作、強力適應力及領導才能等等。有趣的是，過半被訪者(65.4%)均認為身為廿一世紀廣州/香港的青年人，具備市場經濟知識是應付社會挑戰的最重要條件。但從一個較深入的角度看，兩組學生除了對此點意見一致外，對其他方面則有很大之分歧，例如：在技巧方面，大部分穗生(61.3%)認為電子電腦操作是廿一世紀廣州青年人應付社會挑戰之最重要技能，遠超過香港學生(39.7%)。相反地，港生中有 27.6%選擇語文運用，多於穗生(13.1%)兩倍。

從發揮性題目之答案中，可進一步了解兩地學生對希望獲得之知識、技能及素質的看法，以及他們對現時課程所提供的知識的看法。下列穗生(首十位)及港生(後十位)的個人對有關事項的意見。

表三：穗生

最渴望擁有的知識、技能和素質	能在現今的學校課程中獲得嗎
語文能力、電腦操作、思維培訓	一部分。校內多注重課本知識，很少社交
良好的外語運用能力，世界發展趨勢及與人相交的素質	不能。現在的高中教育及整個中國的教育制度都是應試教育，考試是一切
社交技能、強壯的體魄，靈利的口齒	學校課程缺乏社交訓練，而體魄及口齒則可通過體育訓練和口語中獲得

健康的身體、心理素質、社交素質、審美素質及思想道德的素質	很不夠，因功課緊張、自己毅力及自信不夠
市場經濟、語文運用及與人溝通	不是完全獲得
流利說出多國語言，處理好人際關係	部份可以。通過與人相處，但在語言掌握方面是非常少的
抽象思維和獨立處事能力	不太能，課程知識都是理論，是條條件的東西
電腦、荒島求生及自救技能	不能。學校不教授以上技能
市場經濟，世界運作及交際知識	不能。學校課程接觸的全是理論上的問題，缺乏實踐
文學修養，個人素質、操作技能	不能。許多課堂上(教學)限死(某些)知識，以後在社會也沒有用

表四：港生

最希望獲得之知識、技能和素質	能在現今課程中獲得嗎？
世界運作	有。從經濟及歷史科中獲得
電腦技巧，普通話，批判思考能力	某些批判思考能力由老師灌輸
獨立思考能力及懂電腦操作	不能。學生太依賴老師，電腦課程還未普及
專業及專門的知識，設計將會是重要的科目	不能。參加課外活動，充實自己
用正當方法得到最大回報	能。因德育及經濟方面的培訓
游泳，思想成熟，懂得面對困難及打擊	不能。現在課程祇要死讀書便成，未能令學生有獨立思考能力
交際能力，敏捷的思維，豐富的思想及學識	不太可以，因很少這方面的訓練
與時代並進的知識，如科技等	不能。將來所面對的根本不同
懂得於任何環境下，善用資源及時間去處理問題	不。學校及課程所提供的問題範圍狹窄，很少結合生活實際之問題
於課本中充分認識社會，獨立思考能力和處事能力	不能。學校多注重學術科目

訪問的結果顯示，整體上被訪學生都希望擁有多元化之技能，特別是工商性、科技性及思考性等方面的技能，對專業知識之追求也遠超過對基礎知識的需要，這反映他們擁有功能性的課程觀。港穗學生對提高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獨立生活技能都非常重視。不過，本研究的結果並沒有顯示穗生比港生更熱衷於追求專業知識，這與杜淑冰、謝惠娟(1998)的研究結果不同，箇中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被訪學生人數較其研究對象為多(約近三倍)，其平均年齡也較小。

兩地學生普遍均認為現今中學課程內容與他們成人生活所需的有差異。課本的內容過份理論化，課程目標限於為學生準備應試，故此忽視了生活技能的培訓。這反映了香港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工商業社會這個不爭的事實，廣州也正步其後塵。面對一個轉變中的新型社會，純課本知識實在不能幫助高中學生為將來的就業和生活作好準備。上述結果既引證了現今港穗青年人對成人生活及將來社會的多元化需求的較現實的觀念外，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自己應付社會挑戰的實力的評價。

學生對改善課程之建議

表五：建議改善課程的內容

	增加高科技訓練	加強外語運用訓練	加強人際技巧	多元化考試制度結合理論及生活技巧
穗生人數	113(11.8%)	74(7.8%)	83(8.7%)	297(31.1%)
港生人數	214(16%)	183(13.7%)	221(16.5%)	644(48.1%)

港穗學生就課程內容的改善建議有明顯的差異($\chi^2=436.829$, $p<0.000$)。有 13 位穗生和 13 位港生沒有作答此題。數據顯示，穗生對各選項排列為：「採用多元化的考試制度，把課本的理論和日常生活技巧結合起來」(31.1%)、「增加高科技訓練」(11.8%)、「人際關係技巧」(8.7%)以及「外語訓練」(7.8%)。港生的排列則為：「採用多元化的考試制度，把課本的理論和日常生活技巧結合起來」(48.1%)、「人際關係技巧」(16.5%)、「增加高科技訓練」(16%)及「外語訓練」(13.7%)。換言之，學生對改善課程內容的建議，並非純粹從課程能否協助個人面對高科技和語言運用的挑戰考慮，他們對整體學校課程實施及學習評核方法，其實有更深切的想法也顯示他們希望改善現行考試制度之意向。

學校等級及建議內容兩者具顯著差異($\chi^2=337.52$, $p<0.000$)，即港穗生所就讀之學校等級與他們對課程的建議內容有密切的關係。結果顯示，就讀於一等及二等學校之學生較其他等級學生重視評核方式的改革，建議採取多元化方式，加強學科理論及日常生活技巧的測試，這比加強科技、外語或人際關係訓練更顯為重要。就讀於五等學校的學生則對評核內容多元化，高科技訓練、外語等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的取向。

表六 (什麼是您一生中最高望做到的事?)

	一等學校	二等學校	三等學校	四等學校	五等學校
名成利就	36.7%	35.8%	38.5%	45.4%	39.4%
找一個好伴侶	16.8%	20.2%	21.7%	8.3%	10.6%
學業有成	25.1%	23.5%	18.9%	22.2%	29.9%
平淡地生活	8.0%	10.4%	14.0%	8.8%	13.9%
出色政治人物	3.4%	1.6%	2.1%	3.6%	1.6%
其他	10.0%	8.6%	4.9%	11.9%	4.6%

表六展示不同等級的學校學生對人生目標的不同看法。48 位被訪者沒有作答此題。資料顯示，無論就讀於那一等級學校的學生均選擇名成利就為人生目標。根據這結果，港穗高中生的人生價值觀相近。此外，就讀於成績最欠理想的學校的學生，卻是最渴望學業有成的一群，雖然他們常被喻為無心向學，他們內心那種強烈的求學情緒，以及成績與理想的矛盾，實在是與現今社會把個人前途與學業成績掛 的看法有莫大的關係。

等級及班別與課程評價

從樣本學生所提供的學校等級(Banding)及學生所就讀之級別(Class)資料來看，學校等級和級別兩者均同樣是影響兩地學生對學科內容評價的因素。根據 One-way ANOVA 統計數據，就讀於五等學校之穗生對學科內容的滿意程度最高(平均值 2.26)，高於一等(平均值 2.15)及四等學校(平均值 2.03)的穗生，這些五等學校的穗生大都認為課程能幫助他們面對挑戰。另外，他們預計家人對自己日後前途的信心(平均值 3.24)則較二等(平均值 3.32)及一等學校(平均值 3.71)的穗生為低。不但廣州一等學校的學生認為家人對自己的前途信心較高，同樣地，香港的一等學校學生(平均值 3.31)高於三等(平均值 3.09)、五等(平均值 3.17)甚或二等學校(平均值 3.21)的學生。表明了就讀學校的等級與學生家人對他們前途之信心有極大的關係。

級別方面，高一(中五)穗生(平均值 3.05)對課程的滿意度明顯比高二(中六)(平均值 2.90)及高三(中七)(平均值 2.80)為高，他們認為課程能助青年人面對社會上的挑戰。至於估計家人對自己前途的看法，則高一(平均值 3.57)及高三(平均值 3.56)穗生的學生家長比高二生的較樂觀(平均值 3.2)。

港生方面，中五學生(平均值 2.23)對學科所提供之幫助較中六(平均值 2.19)及中七(平均值 2.08)學生為滿意。但對課程的滿意度，中六學生(平均值 3.10)則大於中五(平均值 2.96)及中七學生(平均值 2.84)。中六生估計家人對他們前途的信心(平均值 3.33)也比中七(平均值 3.25)及中五(平均值 3.19)生的為高。

討論

傳統上，港穗中學生對課程的設計及發展的參與，十分有限，且只處於被動的位置，有關的研究亦很少。教育決策者和老師都甚少從學生們的角度出發，對課程作客觀的分析，了解學生的需要以及發展適合他們的課程。透過是次調查，我們發覺學生對日常所學之內容其實是非常之關心的。接近半數(41.5%)的整體被訪者，都認為現今課程的內容過於注重課本知識和理論，他們覺得評核方法應盡量多元化，如加插平日課堂考察及生活技巧的測試等。本港各界近年對會考的評核方式和以考試為主的學校教育內容的討論(Lee, 1991)，其實已經到了非正視不可的地步。雖然有四科會考和八科高級程度的考試已把學生平日的課堂表現計算在內，但其他主科成績還是以一次公開試作定，並不能讓學生表現其真正的能力，實在需要作出全面的檢討和改革。

結果顯示，港穗兩地學生對廿一世紀的技能挑戰的看法也有不盡相同之處，港生較關注外語技能的掌握，這也許是由於香港一直都是一個東西方文化的匯合

點，也是一個工商業中心有關。維持高水平的外語能力是其中一個國際社會對廿一世紀香港的重要要求之一(梅卓琳，1993)。反觀穗生對高科技操作比外語更為重視。這與廣州現正邁向高科技及市場經濟的發展，電腦操作是新型工商業城市所必需的技能，也因而成爲穗生所重視的社會技能之一，而港生對電腦操作較穗生爲熟練，相比之下自然沒有那麼強調了。不過，可以確知的是，勞動市場之需求與改變，直接影響著中學生對課程的適切性的評分，也同時影響著他們日後選擇職業的取向。本研究結果與香港預科生的選科取向相同(明報，12/7/1998)。如果教育是與時並進，並要回應社會的需求的話，則決策者不能不考慮學生完成中學階段後所要經歷的成人生活階段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實際上他們所要面對的社會對他們會有甚麼要求。

在建議增設的課程內容方面，港生較穗生注重人際關係技巧、高科技及外語的訓練。港生對人際關係的重視反映出現今課程內容未能充分給予此方面的培訓，從他們所提供之發揮性問題答案中看到，這與香港的填鴨式教育過份注重個人學業成績不無關係。另一方面，如內地學者梁英(1991)所說，「智力興技」會對勞動市場帶來壓力，穗生所面對之應試壓力雖有加速之勢，但其課程仍比香港的較爲重視社會參與，如集訓和勞動課等均對穗生之群體意識及社交技巧培訓有幫助(廣州穗港研究所，1997)，故此，穗生把人際關係之技巧排列於科技訓練之後。

總結

本研究引證了港穗高中生對所處的及未來的社會挑戰有一定的關心和認識，而這些可能是從應試爲主的課程以外 - 社會傳媒或朋儕中 -- 獲得的。港穗兩地對人力市場需求不斷在變，在競爭文化的影響下，學生之中普遍存著一種較務實和功利化的態度，這反映在他們渴望擁有之知識、技能及態度中(杜淑冰、謝惠娟，1998)。港生處於一個自由競爭之工商業社會中，凡事講求效率和適應，一方面與人相處是一門重要的就業技能，另一方面，在競爭生活又往往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爲時下青年人在情緒上帶來很大之衝擊，這實在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探究。廣州自內地經濟改革開放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工商業發展迅速，競爭意識高，整體社會發展步香港後塵，穗生預計自己將同樣地面對著人際關係之問題，這轉變亦值得港、穗課程決策者關注。

對於兩地的學生來說，高科技的挑戰也是非常實在的。雖然港人在科技發展上並不落後，但由於科技日新月異，做到與新時代並進並不易。特區政府已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建議在小學推行電腦教育，又肯定外語是協助青年人趕上科技時代，保持香港於世界工商業中扮演重要角色之主要媒介之一，政府推行之兩文三語政策的原因也在此。上述之研究結果顯示，香港青年人對未來社會發展並不是

如回歸前的常抱一種被動或冷漠之態度，反之，他們擁有一種面對世紀挑戰、積極向前之勇氣。基於以上他們對課程內容之建議，我們能察覺到他們擁有一些與教育工作者或課程政策者相同之觀點，實在值得參考。而他們對廿一世紀課程的貢獻，則可以從提高他們的參與入手。

縱使被訪者預計在新世紀中他們將會面對多種挑戰，他們之中仍然以認為自己可以應付困難的較多，這反映他們對自我應付難題的能力，甚具信心，對於前面的挑戰亦勇於接受。如果我們能配合他們的鬥志，在課程內容及活動中加強勵志與難題處理的課題，教育將會收事半功倍之效。在整體課程革新方面，兩地的前線教育工作者和決策者除了要努力推動校本課程的發展外，首要任務更要肯定學生同是課程創造者和使用者的角色，給與參與課程發展機會，讓他們參與建立富彈性的校本模式和多元的評核方法，真正達到施瓦布(1986)提出的課程「實踐興趣」，讓學生和老師共創課程內容，使學生更主動地學習和成長。

參考資料

- 教育及人力統籌局(1999)。《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香港：香港特區政府印務處。
- 單丁著(1998)。《課程流派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杜淑冰、謝惠娟(1998)。〈穗港青年就業比較研究〉。載於《青年探索》，第五期，頁 20-22。
- 曾榮光(1998)。《英中學額分配政策的匱乏與不均等：香港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再思》。香港教育政策研討系列論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 譚建光(1998)。〈經濟發達與青年思想教育改革〉。載於《青年探索》，第四期，頁 22-24。
- 教育及人力統籌局(1997)。《一九九七年施政報告》。香港：香港特區政府印務處。
- 廣州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1997)。〈邁向 21 世紀的中國青年課題〉。載於《中國青少年研究》，第四期，頁 2-9。
- 李永傑(1996)。〈邁向 21 世紀的穗港經濟合作及其經濟增長中心的功能〉。載於《廣州社會》，第四期，頁 20-25。
- 周維平、丘杉(1996)。〈世紀之交的穗港澳經濟關係〉。載於《廣州社會》，第五期，頁 9-15。
- 葉世雄(1994)。〈廣州城市教育綜合改革實踐與構想〉。許任之主編(1994)。《建立廣東特色的教育體系》，頁 103-113。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 梅卓琳 (1993)。〈國際教育合作:澳洲經驗及其對香港發展的相關性〉。載於《嶺南學院銀禧紀念公開研討會文集》。香港：嶺南學院出版。
- 楊紫芝 (1993)。〈香港教育發展之展望〉，載於《嶺南學院銀禧紀念公開研討會文集》。香港：嶺南學院出版。
- 梁英(1991)。〈廣東科技隊伍的分析及對人才需求的思考〉。李修宏、周鶴鳴主編《廣東教育環境與發展戰略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盧林法、蕭麗萍 (1988)。〈港穗兩地中學教師對「好教師」的觀感〉。載於《教育研究學報》，第三卷，頁 54-60。
- 明報，《被高失業率嚇怕，寧可早點(賺錢)考生選科考慮市道多於興趣》。1998 年 7 月 12 日，A3。
- Kwok, S. Class work count in bid to cut down stre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9, 1998. p.1.
- Behar-Horenstein, L , Amatea, E., & Sherrard, P. (1999).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contemporary curriculum issues*. In A. Ornstein, & L. Behar-Horenstein, L. (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curriculum* (pp.3-19).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Bremner, S., Keobke, K., & Maxwell-Reid, C.(1997). New faces in the class: perceptions of PRC students on studying at HKSAR Universitie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education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Dewey, J. (1968). *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 and the school of society*.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wey, J (1959). *Dewey on education selection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Fullan, M.(1996). Reprinted. *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London: Cassell.
- Gross, P. (1997). *Joint curriculum design*.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ilbert, R., & Robins, M. (1998). *Welcome to our world: realiti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California: Corwin Press, Inc.
- Lawton, D.(1983). *Curriculum studies and educational planning*.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Lawton, D.(1975). *Class, culture and the curriculum*.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ee, W.O. (1991). *Social change and education problems in Japa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 Morris, P. (1996) (2nd edition). *The Hong Kong school curriculum*.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orris, P. (1992). *Education paper 7*.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Postiglione, G.(1991). The de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education. In G. Postiglione, (E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Toward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pp.3-38). New York: M.E. Sharpe, Inc.
- Schubert, W.(1986). *Curriculum: Perspective, paradigm, and possibility*. New York: McMillan Publisher Company.
- Skilbeck, M.(1984).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London: Harper & Row.
- Tyler, R.(1949).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uen,Y.M.(1995). Hong Kong 1997: *Changing politics, changing values and changing curriculu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